导　论

价值问题从古至今与人类相伴随，是人们每日每时都必须涉及、必须与之打交道、必须予以解决的问题。人类的价值意识也很早就产生了。然而，价值意识的成熟却似乎要缓慢得多。人类对事物的认识经历了从个别到特殊再到一般的过程，对于价值，人们最先形成的也是关于具体的效应、效果和效益的意识，尔后是对各种特殊的价值类型如利、害、善、恶、美、丑等的认识，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才形成了对于价值一般的看法。这便是所谓价值论的兴起，所谓“价值王国”的发现。尽管在价值论出现后的这百余年间，哲学家们对于价值的本质是什么仍各有其说，莫衷一是，但对于价值是一种不同于“事实”的特殊存在现象这一点，却形成了普遍的共识。既然价值是一种特殊的现象，那么，人们是如何把握这一现象的呢？人们了解掌握价值现象的活动又有什么特点？又是如何进行这种活动的呢？而且，人们又是如何运用这种活动的结果和检验这些结果的呢？一句话，人们是怎样进行评价，评价活动是如何运行的呢？这一系列的问题自然而然地就凸现了出来并受到人们的重视，引起了人们研究它的理论兴趣。而当代结构日益复杂、规模相当巨大、影响十分深远的实践

也提出了研究评价活动的任务，提出了评价科学化的任务。

一、评价在人类活动中的地位

人自从通过劳动实践实现了“物种的提升”之后，他便以一种主体的身分和姿态来对待世界、对待他与世界的关系，他把世界上的一切都当作自己的对象。人类活动区别于其他一切运动和动物活动的地方,在于它是一种‘对象性活动”。人把自己与自己的活动所指向的对象区分了开来，他不仅实践地处理着自己与对象的实际关系，而且在意识中观念地处理着这种关系，不仅形成了对象意识和自我意识，而且形成对象与自我、对象意识与自我意识的关系的意识。由此，人类活动也就超越了一般意义的“相互作用”范畴和本能活动的水平，而变成自觉的活动。一切物体的相互作用,也可以说是‘有对象的”,即互为对象的,但由于作用的双方只是“自在的力量”,所以这种相互作用不可能是‘对象性活动”。高等动物的本能性的活动,也以一定的对象存在为前提，并直接地改变着对象物的形态、位置等，但动物的活动与它自身的存在是直接同一的，它的存在就是它的活动；动物的活动与活动的对象也是直接同一的，对象只是动物活动的简单的诱因和刺激物，是活动自身的一部分。由于动物“意识”不到对象与活动的区别、对象与自己的区别，所以这种活动只能算作是一般物体相互作用的发展形态，是因果关系的高级形式。人类活动从动物活动发展而来，它以一般物体的相互作用为其原始基础，以动物的本能性活动为生物学前提，它与它们有着相似和相连续的一面，

但更与之有着本质的不同。只有人类活动才是对象性活动。

人类活动对象的具体形态千差万别，但从总的类属或范围上看，无非是三大类。一是自然界或自然对象；二是社会对象，包括人工物、人与人的关系、人与他人的活动及其产品的关系；三就是自身，包括自己的身体、需要、思想、情感、意志，自己的活动及其结果。任何一个现实的人，他的任何活动，都可从这三个维度上找到自己的位置,或是处理与自然对象的关系的活动,或是处理与社会对象的关系的活动，或是处理与自身的关系的活动。当然，这只是一种静态的大致的区分，实际上，这几类对象和这几种活动又是密切联系、互为中介、相互渗透的。无论从活动方式、活动过程还是从结果上看都一样。人与自然的关系以人与人的关系为中介，人们处理与自然对象的关系的活动，即通常所说的生产活动，既以一定的人与人的关系为基础和前提，又以这种人与人的关系为中介，人们总是结合成一定的社会关系才能进行生产活动。人们总是为了满足自己和自己家庭成员的需要，为了满足社会存在和发展的需要才进行生产的。人们处理人与人关系的活动，也以处理与自然对象关系的活动为前提和中介。这不仅是说，人与人的社会关系是在生产活动中形成并以生产活动为基础，更是说，只有借助于生产活动的成果、生产方式的改变，才为合理地处理这种人与人的关系提供了手段。财富的分配总得以先把它们生产出来为前提，没有生产的相当发展，没有相当的社会财富，人们的关系就必然是低水平的，合乎人性的人际关系也难以形成,因为争夺食物的斗争会把一切理想的东西打得粉碎,至少是把它们搁置在一个无足轻重的位置上。同样的道理，人处理与自身对象关系的活动，即人的自我认识、自我改造、自我发展、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自我实现，也依赖于整个社会生产发展的水平和社会人际关系的水平。任何人都是通过其他人来映现自己的。他的本质力量和发展水平，就体现在他处理人际关系和处理与自然对象关系的活动中，也是在这些活动中得到提高的。离开了后两类活动，自我修养、自我发展只能是一种抽象和玄思，甚至连自身的存在都保不住。人始终是社会性的存在物，也只能是社会性的存在物。

从人类活动的性质上看，又可将它们分为两种，一种是观念活动，即观念地、精神地掌握和处理自然对象、社会对象和自身对象的活动；另一种是实践活动，即现实地改造、利用和享受这几种对象的活动。这两种活动同样也是相互依赖、相互渗透、互为前提、互为中介的。一方面，观念活动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人通过实践而形成对活动对象的观念、活动过程的观念和活动主体的观念，并利用实践来检验、校正自己的观念。另一方面，实践活动又以一定的观念活动为前提，由以形成了实践的目的、计划，并借此对实践活动进行调控使之成为有目的的、有序化的活动。正是这种互为前提、互为中介的关系，使这两种活动既相互区别又相互渗透、难以分割，促进了它们的相关发展和共同提高。

人类活动是一种对象性的活动，也是一种有目的的活动。在对象性活动的概念中内在地包含着目的性，而目的性的特点，又进一步突出了和深化了对象性活动的丰富内涵。

关于目的，哲学家们有不同的定义。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目的是人为自己设立的，是活动所欲达到的结果的观念形态，是主体关于改造过的对象的观念。任何目的的形成和存在，都表明了人对对象世界的不满足，表明了人的活动的指向即变动对象以适应和满足自己的需要和要求。这对象可以是外在对象，也可以

是自身对象，人们改造自身的活动，包括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的活动，也是由于对之不满意、不满足的结果。如此看来，任何一个目的，至少都含有三个要素：(1) 对对象的一定的了解；(2) 对自身需要的一定意识或觉悟；(3) 对对象与需要之间现有关系和将有关系的一定的意识。三者的综合才产生出作为活动结果之超前反映的目的，亦即按照自己的需要和要求在观念中改造过的对象。这里所说的活动，包括了上述的各种活动，自然这里所说的对象，也包括着上述各种活动的对象。强调这一点不是没有意义的。因为在国内一些哲学论著中，有人将对象性活动和目的作了较为狭窄的理解，对需要也作了较为狭隘的规定。例如有人认为需要不能作为价值的尺度，因为像自我修养、完善人格的价值就无法根据需要来加以确定，需要并非天然合理，调整某些需要、压抑某种需要可能就具有很大的道德价值，这些价值也不是根据需要来加以衡度的。其实，人们之所以进行自我修养完善人格，正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道德意识状况不很满意；之所以调整一些需要、压抑一些需要，是因为这些需要的满足会引起对满足其他需要的伤害，他是按照整体的需要来调整个别需要的。

人类活动还是一种中介性活动，是一种借助于工具、以工具为中介而进行的活动。人比其他动物高明的地方，就在于人能有意识地制造和利用工具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在发展了的形态上，人还能更广泛更深刻地利用自然界物体相互作用的规律，利用动物来为人的目的服务。工具由目的而得到界定，凡是可以利用来达到目的的东西都属于工具或手段的范畴，都属于人在自己和目的之间插入的中介系统。也即是说，这里所说的工具是广义的工具，它包括天然工具和人工工具，包括实物性工具和观念性工具。人

利用自然力量之间的相互作用来巧妙地达到和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相互作用就变成了人的工具。当然，动物也可能利用天然工具，如木棒、草棍等等。现代心理学家发现，黑猩猩会利用木棒来捅出放置在管子中的食物或用草棍来勾出洞中的白蚁，它们只是不会制造和保存工具。在这个意义上，把人定义为能制造和使用工具的动物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也要看到，人们制造和使用工具的活动，起初表现为对所造工具的依赖，后来则大大开发了使用工具的能力，大大拓展了工具的范围和利用工具的意识，扩大了活动的中介系统。可以说，在人这里，一切其他物种的尺度，一切自然规律的作用，都变成了人可以利用的东西。相对于一定目的而言，它们都可以看作是手段性的存在、工具性的存在。正如马克思说过的那样，在人看来，自然界的存在“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①。扩而言之，一切现存的东西，无论是自然的还是人工的，无论是实物性的还是观念性的，都在某种意义上有着工具的意义，都可以被用来作为达到更高目的的手段。

在人类活动中，目的和手段（工具）形成了一种“链式反应”的关系，一定活动的目的又可以成为进一步活动的手段，在一种意义上为手段的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又成为目的。它们的区别如同原因与结果的区别一样，完全是相对的。不仅人之外的其他存在、其他对象，相对于人的一定目的而言具有手段的性质，而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 卷（上），第 393 页。

且人自身也成了目的和手段的辩证统一。马克思在谈到商品生产条件下人与人的关系时指出：“每个人为另一个人服务，目的是为自己服务；每一个人都把另一个人当作自己的手段互相利用。这两种情况在两个个人的意识中是这样出现的：（1）每个人只有作为另一个人的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2）每个人只有作为自我目的（自为的存在）才能成为另一个人的手段（为他的存在）；（3）每个人是手段同时又是目的，而且只有成为手段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只有把自己当作自我目的才能成为手段”①。

从上面关于人类活动特点的粗略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出,人类活动始终是围绕着价值这个轴心而旋转的。人类活动，从总的方面来看，是为了改造对象以满足自己的需要。这种客体对主体需要的满足关系，就是价值或价值关系。从分的方面看，任何活动，任何活动的任何环节上，也都渗透着、贯穿着价值问题。可以这么说，人类的一切活动就是为了发现价值、创造价值和实现价值、享受价值而进行的。人们设立一定的目的，意欲使对象发生某种形变、位变、态变，是因为这种变化有利于人的存在和发展，能使人的存在和发展的需要得到一定的满足，亦即是说它对主体有价值，至少必须是主体认为它对自己有价值。否则，主体就不会抱有这种目的，不会有这种意欲和动机。因而，目的的本质可以说是一种价值的想望和预测，是主体在活动之前预先构成的某种价值状态。目的的选择和确立，要以对一定对象及条件的认知为基础，但核心的东西却是价值和评价。对象变化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主体只把对自己有利、有价值的那种可能和变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46卷（上），第196 页。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结果，当作自己的目的和努力的方向，而绝不会把无价值甚至有害的结果当作目的。

主体确立目的的过程同时也是一种选择目的的过程。而目的一经确立，他又面临着选择手段的问题。一般说来，对于任何一个目的，实现或达到它的途径、方法总是多种多样的。目的是一，手段则是多。主体可以根据何种方法、何种途径、何种计划方案更能有利地、节约地达到目的而在它们中进行选择。利用以选择为前提，是有选择的利用。不过在这里，目的就起了一种价值尺度的作用，一种评价标准的作用。作为价值尺度，它实际地规定着什么手段有价值或无价值、有利或有害，什么手段价值更大或更小。作为评价标准，主体在观念中用它来衡度各种手段的价值和利弊。无论怎样,主体总是优先选择那些他认为是最有价值、最有利的手段，利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人的任何活动，无论是认识活动还是实践改造活动，无论是认识和改造自然对象的活动还是认识和改造社会对象、认识和改造自身的活动，都服从着这种目的和手段关系的规律，都存在着这种选择的问题。主体为自己选择目的，更要选择实现目的的手段。而选择的客观根据是价值，主观根据则是评价。

人们惯常认为，选择是根据事物变化的规律，包括中介系统与客体系统相互作用的可能性和规律来作出的，只有合乎规律的选择，才能达到成功的目的。固然，主体的选择不能离开这些规律和可能，如果选择违反了这些规律，活动就无法达到目的。但不能因此就说选择的客观根据是规律。人们活动时面临的世界是一种多种事物相互作用的世界，每一种事物的运动都有自己的规律,各种事物、规律又相互作用,于是出现了相生相克的现象,出

现了生生灭灭的现象。人的活动无论多么具有创造性，也不能创造出一个物质原子，而仅仅是改变事物运动的形式，使之服从和合乎自己的目的和需要。很显然，在面对众多的事物和规律时，主体只能是选择利用对自己有用的规律，而排斥和反对那些对自己不利的规律，尽可能使前者顺利运行，而限制或破坏后者起作用的条件。人的存在和活动，不可能逃脱客观规律的制约，摆脱因果作用的限制，但人作为主体，其本质又恰恰在于要在一定程度上超越自在的因果关系和客观规律，依靠自己的能动性，认识和利用因果规律。客观规律是一种自在的力量，但经过人的选择和利用，它又成为一种自为的力量，成为主体维持和发展自己的手段。主体选择和利用规律，正是出于价值考虑而进行的。在这里，规律的客观性并没有消失，但却退居次要地位，突出的是它的属人性质，即对主体所具有的特定的价值性质。主体是根据各种规律、各种相互作用对自己的价值大小来选择如何利用它们的。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易燃物品如家具、粮草、房屋等遇到火种就会燃烧，这是一个规律；水能使火熄灭，这又是一个规律。如果主体需要破坏敌方的营房、辎重，那么他可以选择利用前一个规律，使敌方蒙受损失，以利于自己消灭对方。反之，如果在自己一方遭到敌方的火攻或遇到火灾时，他又会选择利用水能灭火的规律，不让前一个规律作用扩大。由此可见，选择的根据是一定规律对选择者、对主体的价值，而不是这规律本身。

既然选择的客观根据是价值，那么为什么人们还会常常作出错误的选择，选择了一些价值不大或者具有负价值的事物和行为呢？这就涉及到选择的主观根据问题，涉及到人们的评价问题。一定的事物、对象、事件、行为对一定的主体实际上有没有价值、有

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这是一回事，而主体认为它对自己有没有价值、有什么价值、有多大价值，则是另一回事。二者间可能一致也可能不一致，不一致的程度或小或大。尽管说主体总是倾向于选择对自己（包括对自己的集体、国家等）有利的事物和可能，选择对自己有价值的对象，但他却不能保障自己的评价必然与价值相一致，不能保障自己认为是有利的东西必然在客观上就是有利的东西，自己觉得最好的东西实际上就是最好的东西。主体只能作为一种“有限的理性”而存在，而且他只能在自己意识到的各种事物和可能的范围内，依据自己对它们的评价来作出选择，依靠试错来纠正选择。在这个意义上说，评价是选择的主观根据，选择是评价的外化或现实化。主体有什么样的评价，也就有什么样的选择，主体的评价能力有多高，他的选择能力也就有多大。

很显然，价值作为选择的客观根据是通过评价这个中介来决定和影响选择的，直接决定选择的是评价。当然，作为客观根据，价值不仅从对象方面制约评价，而且从活动结果上规定着评价的合理性和恰当性。主体总是根据活动结果的实际价值来检验、校正他的评价和选择。

综上所述，人类活动作为对象性的活动、有目的的活动、有中介的活动，规定了主体的选择在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规定了评价的地位和作用。因为选择是评价的外化，选择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同时也就是评价的必然性、必要性和重要性。评价在人类活动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是自古以来就如此的，只是到了现代，才由于实践的复杂化和问题的突出而受到人们特别的重视。

二、现代实践及其对评价的要求

人类活动既是一个绵延不断和发展着的流，同时又可分出若干不同的阶段。不同的阶段既有一定的共性，又各自有自己的特性。在这种特性中，就包括了实践活动的特定水平、特定能力、特殊性质，以及对作为选择活动目的、活动方式、活动手段的主观根据的评价的特殊要求。

我们知道，在前资本主义阶段，农业生产是社会的主导产业。农业生产的自给自足性，对土地和气候的严重依赖性，以及春种秋收的缓慢节奏和周而复始，以家庭为生产单位主要依靠家长的经验来管理，等等，这些特点都对整个社会文明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生产力低下，生产规模狭小：缺乏较普遍的交往，形成了社会生活的浓厚的封闭性。每一代人的生活基本上都是沿着上一代人的生活轨迹而运行，使得人们只能在狭小的‘世界’中生活，极大地限制了人们的眼界和选择的重要性。人们一生中的重大事务都按传统、长辈的经验和常规来进行，个人的社会地位的尊卑为家族和出身所决定，田产房屋为祖宗遗留，婚姻大事依父母之命，婚丧嫁娶、四时八节、亲友交往，都有常礼可遵、常例可循。选择的机会少、余地小，人们独立选择和评价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也都不很突出。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所有这一切都变了样。马克思恩格斯曾经形象地描述过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特征，“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在于“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关系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因此“一切固定的古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

老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人们终于不得不用冷静的眼光来看他们的生活地位、他们的相互关系”①。由资本主义所开启的工业时代大大加快了社会变化的节奏和速度，工业生产代替农业生产而成为社会的主导产业，工业生产极大地减弱了对气候、土地等自然因素的依赖性，同时也促发了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工业生产从根本上说是一种创造性的生产，也是为交换而进行的生产即商品生产。它打破了农业生产固有的慢节奏和自给自足性；产业之间和产业内部的分工加强了相互协作和交往的必要性；市场竞争迫使人们对生产中的各种要素如时间、空间、物力、人力、财力都必须精打细算力求节约。都市化的过程加快，人口自由流动的规模加大。生产资料的市场调节和自由配置，市场的风云变幻，这一切既为人们提供了广泛的选择机会，也增加了选择的风险性。而到了现代，生产规模更加扩大，世界市场业已形成，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和通讯设施，使人们真正成为了世界公民。人们可以借助于电视、广播、电话、电传及时地了解到整个世界的变化，人们可以通过飞机、火车、轮船远距离地进行工作和交往。背井离乡不再是传统的流浪汉的特征而成了现代人的普遍特征。生活的节奏明显加快，选择的机会大大增加，各种设施和信息为人们提供了广泛选择的可能，而传统的经验、祖宗的遗训、圣人的教诲、父辈的教导根本不足以应付事变，不再能有效地指导人们的选择。人们只能依靠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依靠自己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1 卷，第 254 页。

的评价来进行选择，来承担选择的责任和后果。

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人们的需要也相应地发展和丰富起来，人们对生活质量的要求也越来越高。这突出地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对自由、平等、自尊、个性独立的渴求大大高涨。今天的青年人不再像他们的祖辈那样甘愿依附在大家庭的卵翼之下，不愿按长辈的指导和命令去行事，他们要求长辈充分尊重自己的权利，平等地对待自己，要求择业、择偶这样的问题由自己来决定，要求有自己独立的社会生活。大家庭解体，代之而起的是一个个独立的“核家庭”。在工作单位，人们也不安于单纯地接受“指示”和“命令”，不满于“管卡压”那一套传统的管理制度和方法，而是要求参与，要求管理者、上级尊重自己的人格和建议。管理学中 Y 理论对 X理论的革命绝不是偶然的，因为在 Y 理论指导下的管理方法即目标管理更加符合现代人们的心理和要求。弗兰克·戈布尔曾指出过，“Y 理论管理方法优于 X 理论管理方法的另一个原因是独裁的管理方法会伤害工人的自尊心，使工人有意无意地进行反抗以维护自己的尊严”，而“鼓励和理解有助于工人维护自尊心并大大提高他们的效率”[①]。第二，对“合意性”的理解和要求与以往大不相同。无论在家庭生活还是在工作场合，也无论对于物质消费还是精神消费，原来觉得差强人意的，现在则感到不满意或很不满意了。原来认为无论什么事“差不多就行了”，现在则力求要达到最佳最优。对自己能力的发挥，对自己拥有的“购买力”（包括财力、物力、人力等等）的使用，对各

① 弗兰克·戈布尔：《第三思潮：马斯洛心理学》，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7 年版，第 108 页。

种消费品的性能的要求，都力求达到最大的合意或最大程度的满足。第三，个性化的追求日渐普遍突出，模式化的东西受到冷遇，大批量的产品往往滞销；时髦的流行期很短，多元化、多样性、独特性成了真正的时尚和潮流。从饮食到服装、建筑、装饰、衣食住行各方面，都在向小批量、多品种、多样化的方向转化，以适合各种消费者的个性特色和独特“胃口”。这种趋势日渐强劲，以至有人惊呼“小的就是好的”。总之，人们的选择自由越来越大，选择能力也越来越高，对选择对象的要求也越来越“苛刻”和“严格”，人们变得越来越“挑剔”了。这种情况自然也就突出了评价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因为选择总是以评价为前提的。

再从现代实践总体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历史发展到了现代，人们征服自然、变革自然的能力大大增加，实践规模大大扩大，实践活动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以往，人的活动对自然界的影响、破坏和改变相对说来比较微小，还不足以引起生态的失衡，或者说这些改变和破坏尚处在自然生态能够自行修复的范围内。而到了现代，大工业一方面需要大量地开采自然资源，生活质量的提高以大量消费自然资源为代价，另一方面又要排泄出大量的废气、废水、废料，工业垃圾和生活垃圾的巨量堆积使自然界难以承受，无限制的过量开采又使自然生态的再生能力大大减弱，这样就使自然生态处于难以自行修复人为创伤的状态，出现了严重的生态失衡。高科技的运用，一方面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能量和财富，另一方面也引起了十分严重的问题，例如关于核能的利用、生物工程、基因工程等等，稍有不慎，其后果就不堪设想。一些超巨型的工程，也存在这类问题，例如我国的三峡工程的论证之所以经年累月，就是因为它的后果和影响十分巨大而深远，如果出了问

题，其危害不仅是大面积的全国性的，而且可能会延续到子孙后代。恩格斯在 100 多年前就指出“：如果我们需要经过几千年的劳动才稍微学会估计我们生产行动的比较远的自然影响，那么我们学会预见这些行动的比较远的社会影响就困难得多了。”[①] 现代实践证明恩格斯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在我们今天，由于交往的普遍化，一个行为、一个决策所产生的影响也较以往时代要大得多，有的甚至会形成全球性的影响。中国 50 年代中期人口政策的失误，给今天造成的压力是每个人都能感受到的； 50 年代末的反右扩大化、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使中国失去了近 20 年的大好时机，造成了几代人才的损失，拉大了与先进国家的距离，而它在人们思想上和社会风气上造成的创伤恐怕还要更深刻和巨大。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解体和演变，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来说，损失无疑是巨大的，但造成这个事件的原因，恐怕在几十年前就种下了。所有这些问题，都要求人们提高对行为的预见力，要求人们提高评价和选择的能力，特别是预测性评价的能力。为此就必须深入研究评价活动的内在机理。

人类的认识能力和实践能力无疑是大大地提高了。可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在人类活动能力提高的同时，其活动的影响也更加深远和巨大，各种反主体效应更加突出和触目惊心。现在世界各国的有识之士都用不同的方式指出或暗示，只有人类才是能够毁灭人类自身的力量。直接地讲，人类现已拥有的核能量可以将地球、将人类毁灭几十次，稍有不慎，核冬天就不再是科幻作家和科学家们的预言而会变成残酷的现实。间接地看，人类对生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卷，第 518 页。

环境的破坏所导致的臭氧洞扩大、温室效应、资源枯竭等等则会造成一个不适于人类居住的地球环境，至少是一种人们十分不愿意看到、不希望出现的环境。在我们的周围潜伏着各种危机，而它们又都是由于人类自身缺乏正确的评价和预见所造成的，是人类的“无知”和“贪婪”所引致的。

人们选择的自由度无疑是大大地拓宽了，社会文明发展的程度无疑大大地提高了，今天的社会财富比起人类以往时代创造的财富的总和还要多。可是，在传统的价值观念已经失去权威性、失效或部分失效之后，新的价值观念尚未普遍地确立，这又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许多困惑，人们的心灵普遍处于一种不安宁、无所依的状态。“人类价值新论”世界大会的主席马斯洛在给各国代表的邀请信中写道：“我们时代的根本疾患是价值的沦丧”；“这种危险状况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严重”；“我们正处在一个旧的价值体系已陷困境而新的价值体系尚未产生的断裂时期”；“我们面临着毁灭的真实可能性”①。现时社会中出现的颓废、道德沦丧、抑郁、失落、空虚、绝望，都源于人们缺乏一种值得信仰和值得为之献身的东西。由此看来，不管是从人类实践发展的角度还是从人的心灵发展、精神发展的角度看，我们时代的哲学都应关注、重视和研究价值与评价的问题，以便给人们的生活以一定的帮助。

关于现代实践对评价的特殊要求，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现代生活实践变化快、常规性差而创新性、探索性强，引起了人们对评价和选择问题的普遍关注和重视，要求各门科学和哲学对于价值和评价能提出较为系统较为可信的理论。在这方面，一些

① 马斯洛主编：《人类价值新论》，河北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第 1—2 页。

具体的价值学科已走到了前面。现代的经济学、心理学、价值工程、管理理论、决策理论、教育学等等，以及伦理学、美学、逻辑学，都或系统或零散地开展了关于具体评价的研究，数学中的运筹学、优选论、排队论、对奕论等直接涉及评价的理论也被广泛地运用于经济学、控制论和系统工程之中。在哲学价值论的层面上如何总结这些成果已成了当务之急。

第二，现代实践的社会化、系统化程度高，实践行动后果影响的深刻巨远，不仅要求提高评价的预见性，而且对评价的综合性、精确化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人们不仅需要粗略地、定性地确定一定行为是有利还是有害、是好还是坏，而且更要求对利比害大多少、好处比坏处多多少作出较为精确的估计。数学在社会科学领域的渗透和广泛运用绝不是偶然的，它反映了人们对生活质量要求的提高和对评价的精确度的关注。这也说明经验水平的评价已远远不能适应现代实践和决策的需要，必须代之以科学的评价和决策。

第三，评价的核心问题是评价标准和价值观念的问题。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评价标准统一性和多样性、社会化和个性化的矛盾，旧价值观念与新价值观念的冲突、磨擦，各个民族的价值观念的冲撞和交流互动，提出了研究和确立合理的科学的社会评价标准体系的问题，提出了导引价值观念合理变革的问题。在我国，改革开放以来，新旧价值观念的冲突和矛盾，旧的价值观念对人们头脑的禁锢和行为的束缚，业已成为诸多社会矛盾的重要思想根源，有的已经严重束缚和阻碍了改革开放的进程。如何在汲取全世界各民族合理的、进步的价值观念的过程中又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特长，已成了全国上下普遍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建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ook.com